

“变”与“不变”:百年中国文化制度建构历程及启示

祁述裕

摘要: 规范人的行为是制度的本质特征。人类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国家制度也包括规范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两大部分。文化制度的功能是规范人的精神生产活动。文化制度内涵丰富,重点是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和文化政策法规等。文化制度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好的文化制度能激发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繁荣;不好的文化制度则会窒息文化活力,阻碍文化发展。因此,促进文化发展繁荣迫切需要加强对文化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文化制度建构历程,可划分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十八大至今四个历史阶段。百年中国文化制度建构历程的主要特点包括: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不断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和具有强大的自我调整和完善能力等。百年文化制度建构的经验及启示有:应把握文化制度建设相关要素的均衡性,保持文化制度的包容性和张力,深入研究文艺发展特点和规律,辩证看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确认识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的关系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2.01.002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是生产关系中规范性内容的凝结。因此,规范人的行为是制度的本质特征。人类活动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国家制度也包括规范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产活动两大部分。文化制度的功能是规范人的精神生产活动。文化制度内涵丰富,重点是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和文化政策法规等。

人类文化发展史证明,文化制度是影响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好的文化制度能激发文化活力,促进文化繁荣;不好的文化制度则会窒息文化活力,阻碍文化发展。因此,促进文化发展繁荣迫切需要加强对文化制度变迁的研究。

迄今为止,系统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制度建设特点的论文还很少。特别是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制度建设与此前中国共产党文化制度建构历程贯通起来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本文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视角出发,以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和文化政策法规为重点,梳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制度建构历程,探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主要特点,总结百年文化制度建构历程的启示,以期进一步拓展中国文化制度研究。

一、党领导下的百年中国文化制度建构历程

党领导下的百年中国文化制度建构历程包括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十八大至今四个阶段。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文化和旅游融合背景下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研究”(21ZD0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2021年度行政改革研究基金资助课题“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文化研究”(2021CSOARJJKT011)。

作者简介: 祁述裕,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创新工程首席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 qishuyu823@nsv.gov.cn)。

(一)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制度(1921-1949年)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和解放区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制度。这一时期,文化制度建构既受到苏联制度的深刻影响,又不断适应当时救亡图存的需要。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

1.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1929年6月,六届中执委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宣传工作决议案》,强调党必须有计划地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1931年9月,湘鄂赣工农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提出,“文化工作的本身是具有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在苏区进行文化工作,就是要尽量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及一切无产阶级革命的教育和理论”^①。

2.构建党领导下的宣传文化管理体制。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规定,中共中央和党的各级委员会均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②。在苏区,中共建立了直属的报刊社。有《红色中华》等34种报纸杂志。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创建了众多的报刊社,出版发行了《解放日报》等几百种报刊。同时,在中央苏区各县建立了一大批直属艺术院团。

3.强调文化服务政治的功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我们不仅要有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文化的军队是团结人民、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4.文化生产活动的高度组织化。一是文艺创作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艺术构思、加工和创造;文艺工作者必须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循组织安排,对生活 and 人物进行选择、加工和创造,以实现让人民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投身解放运动洪流的目的。二是统一调配创作生产资源,如歌剧《白毛女》就是通过组织化方式创作出来的成功案例^③。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制度(1949-1978年)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制度建构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文化领导权;另一方面,通过建构国有化文化管理体制,加强对文化事业的管理。

1.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主要手段是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毛泽东高度重视知识分子的价值和作用。同时认为,旧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接受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新中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先后开展了三次大的思想改造和文艺界整风运动,分别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及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些思想批判运动对于建立新的意识形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方式简单粗暴等问题^④。

2.建立党对文化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成为党中央主管全国宣传、文化、教育、体育、科技、卫生等意识形态工作的综合性职能机关。同时,1949年成立的政务院下设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和管理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新闻总署、出版总署、科学院等机构,其直属机构还包括对外文化联络局、广播事业局、新华通讯社等。随后各级地方政府文教管理部门逐步成立。自此,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政府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的文化管理体制得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7页。

^③ 参见张庚:《回忆延安鲁艺的戏剧活动》,《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3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3年;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和演出》,艾克恩主编:《延安艺术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④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革的思想和观念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10年到15年时间来作这个工作,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这些工作。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97页。

确立。

3.建立文化领域的国有化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以戏曲、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等公有制改造为标志,文化生产领域启动了国有化改革进程。到1951年年底,国有化文化体制基本定型。以演艺业改革为例,当时各类文工团和私营剧团均按照公有制的要求改造成为国营或集体单位两种体制。这种国有化文化体制的基本特点是:产权形态是公有制,艺术团体都有上级主管部门,艺术生产要由上级主办单位决定,人事权由上级主管单位任命,财务收支由政府统一调配,艺术作品生产要经过报批和内容审查的程序。

4.探索完善党领导文化的方式。实行国有化文化体制和按照计划组织文化生产有利于体现党的意志、完成党的任务,但也存在行政效能低下、文化创作生产积极性不高等问题。为此,党中央积极探索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路径。以电影管理为例,为解决伴随着电影业国有化出现的机制僵化问题,文化部电影局于1956年提出了以“三自一中心”(“自选题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和以导演为中心”)为核心的创作生产管理经营改革思路,重点是将艺术创作的责任下放给电影制片厂,在分配制度上采取“酬金制”,在电影厂内部实行“创作组”体制。这些改革措施,有效地激发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艺术创作的进步^①。

为激发文化创造活力,1956年,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随后,党的八大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写入文件,“双百”方针正式成为科学和文艺事业的指导方针。但由于各种原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没有在文艺实践中得到很好落实。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各项工作的总纲,文艺领域教条主义盛行,严重窒息了艺术创造活力。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文化制度(1978—2012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这时期文化制度建设的重点是突破计划经济对文化生产的束缚,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制度。

1.建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积极作用的文化制度。改革开放以后,与经济领域类似,文化领域的一个重点是建立文化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激发文化创造和生产活力。主要做法有:一是推动国有文化单位体制机制改革。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国有媒体开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入21世纪,为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中央于2003年开始实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这次改革提出了“两面向”“两分法”和做大做强国有文化企业等改革理念^②,通过转企改制,出现了一大批国有文化企业,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取得重要进展。二是放开社会力量进入文化生产和销售领域的限制。1979年,广州东方宾馆开设了国内第一家音乐茶座,这被视为当代文化市场起步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营业性舞厅、民间剧团、演唱会、录像放映、卡拉OK、电子游戏等新兴文化娱乐方式不断打破禁区进入市场,形成了文化市场的雏形。1988年2月,文化部、国家工商局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文化市场”的概念。三是不断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如,1980年成立了第一家中外合资期刊《计算机世界》;2001年,按照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大幅度放宽文化市场准入,对现有文化政策和法规进行的较大修改和调整;2004年,允许一些境外卫视节目落地三星级涉外宾馆;2013年,上海自贸区在扩大文化市场开放方面进行试点;2016年,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式开园;2017年,允许设立外商独资演出经纪机构等。

2.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2002年,党的十六

^① 石川:《“十七年”时期中国电影的体制与观众需求》,《电影艺术》2004年第7期。

^② “两面向”是指改革要坚持面向群众、面向市场的原则;“两分法”是指此次改革将国有文化单位划分成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企业两类,实行分类改革。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大把“人民的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要建设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理念是在区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同特点,明确了二者的不同性质、作用和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来的。2003年实施的文化体制改革,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事业一分为二,划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两类。其中,公益性文化事业以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基本文化需求为重要目标,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责任主体,财政投入是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基本要求是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基本特点是实行免费服务。

3.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国家“十五”规划首次将文化产业写入中央文件,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建立健全文化产业政策体系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文化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体系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一是立足于对文化产业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双重属性的判断;二是重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目标,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推动、规范文化产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发布了大量的文化产业政策文件。文化产业政策可划分为管理规范、激励惩罚、规划引导、松绑赋权、体制改革等类型。从中央层面看,规范类的政策文件占主体,这既反映了文化产业政策类别的多样化,也反映了规范文化市场、防止市场失灵是文化产业政策的重点内容。

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发展极大地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但受利益驱使,文化市场也存在过度娱乐化等问题。以影视业为例,一段时间里,宫斗剧、玄幻剧、搞笑剧盛行,反映现实题材的精品力作乏善可陈。其中,2015年中国内地票房排名前十的电影中没有一部反映现实题材的电影作品,文艺创作生产领域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十分突出。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制度建构(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积极推动文化制度建设。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为题,提出了坚持“三个制度,两个体制机制”的要求,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建立舆论引导机制,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①,并做了大量的工作。

以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化创作生产体制机制为例。坚持“双效统一”,首要的就是创作生产出无愧于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习近平同志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致力于建立健全促进“双效统一”的制度。主要做法有:第一,完善相关政策文件。近年来,围绕建立促进“双效统一”的文化制度,中央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2014年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意见》;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2020年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关于文化企业坚持正确导向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等。这一系列文件明确了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规范了文化创作生产行为。第二,完善相关制度。一是大幅压缩文艺奖项数量。科学规范的文艺创作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文艺创作价值引

^①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第1版。

领的风向标。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压缩奖项数量等作出严格规定。以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为例,改革后文华奖的内设奖项从200多个大幅减少到20个。二是规范文艺工作者道德行为。2016年成立了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制定《中国文联文艺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章程(草案)》,设立了一系列行为标准,规范演职人员行为。三是限制天价片酬。近几年出台的相关文件明确要求“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70%”。第三,完善扶持激励机制。通过国家艺术基金、国家出版基金、全国影视重点资助项目等形式,支持各种艺术门类创新发展,推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如2020年9月,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批准设立主旋律影视专项基金,激励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中精彩故事和时代先进人物为主要创作方向的作品^①。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近些年出现了一大批既叫座又叫好的优秀文艺作品,如舞台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电视剧《山海情》《觉醒年代》,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流浪地球》《长津湖》等。

二、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四个突出特点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全新探索,其难度可想而知。完成文化制度建构的艰巨任务,要有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和正确的原则;要适应时代变化,善于吐故纳新,善于吸纳一切有益思想成果;要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防止陷入制度僵滞。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在建构过程呈现出四个突出特点,即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守正与创新的统一、不断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具有强大的自我调整和完善能力。

(一)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是我国文化制度最突出的特点。2019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党委宣传部门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协调职能。该条例指出,“党委宣传部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职能部门,承担着指导协调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旅游业发展的职责”^②。

回顾建党百年历史,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文化工作就被归入宣传工作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成为中央主管全国宣传文化工作的综合性职能机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经历了多次机构改革,中央部门和国务院政府机构设置、文化建设的内涵等都有一些调整 and 变化。其中,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新闻出版署和电影局划归中宣部管理;原国家文化部和原国家旅游局合并,组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尽管宣传文化机构分分合合,“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管理体制和格局始终保持不变^③。

以文化产业管理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送审稿)》第六条指出:“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文化产业促进相关工作。”因此,我国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是党委领导、行业主管部门管理、其他部门参与的管理体制。

(二)守正与创新的统一

“守正”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①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成立主旋律影视专项基金》,中国文艺网:http://www.cflac.org.cn/xw/bwyc/202009/t20200930_509527.html,访问日期:2021年12月10日。

^② 新华社:《全面提升新时代宣传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中央宣传部负责人就〈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答记者问》,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8/31/c_1124945754.htm,访问日期:2021年12月10日。

^③ 参见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守正”的根本。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改革开放以后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十八大以来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纵观建党百年历史,人民当家做主的理念一以贯之。体现在文艺创作生产上,“守正”就是坚持唯物史观,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表现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没有现成模式,需要不断探索。实际上,党领导的百年文化制度建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以文化理论创新为例。延安文艺座谈会即是一次重大的文艺理念创新会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工作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如小说《小二黑结婚》、歌剧《白毛女》等一大批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优秀文艺作品。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文化理念的又一次重大创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以更大的力度进行文化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理念。如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

再以文化产业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产业的兴起具有极大的创新意义。第一,文化产业的兴起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找到了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的有效途径,拓展了文化建设的内涵、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第二,文化产业以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为基本特点,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产业概念、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包括文化市场、文化经济、文化金融、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等。这些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文化建设的内涵,是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拓展。第三,文化产业的兴起促进了理念创新,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理念。如文化既是精神活动,也是经济活动;既是精神力量,也是生产力。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两类文化产品:公共文化产品和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文化市场是文化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主渠道。这些新理念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涵,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建设。

(三)不断吸收外来有益文化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过程也是不断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文化制度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文化制度的架构和运作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初期,苏联仍然是我国学习的主要对象。但毛泽东同志并不拘泥于学习苏联,而是重视学习一切对的东西和好的经验。

比如,1956年2月,毛泽东同志陆续听取34个部委的汇报时就指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要学。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毛泽东还指出:“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就说我们同苏联一样,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也改了,改成跟我们一样,设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①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胸怀天下,以更开阔的视野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文化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经验,如知识产权制度、国有文化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公共文化机构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等。同时,积极吸收国际通行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准则,如国家文化主权理念、维护公民文化权利理念、文化多样性理念等。这极大地推动了国家文化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现代化。

(四)自我调整和完善能力

纵观中外国家制度建构史,一个规律性现象是制度具有很强的传承性。对此,宋元史学家马端临有深刻的观察和论述。他在《文献通考》中说:“窃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无以参稽互察为也。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4页。

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爰自秦汉,以至宋唐,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文化制度建构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情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中国近现代社会急风暴雨式的变革。社会主义文化制度迥异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制度,它不是此前文化制度的延续,而是创造性破坏,是建构全新的文化制度。

打碎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旧的文化制度,建构新的文化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党中央总是不断适应时代变化,完善理念和政策。同时,及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砥砺前行,表现出了强大的自我修复和完善能力,保证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比如,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就经历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我们党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精神,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辩证的和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传统文化,提出“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不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显示了文化上的成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原则,强调对传统文化要批判性吸收。“文革”期间,受极左思想影响,对传统文化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受到极大冲击。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党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赴曲阜考察时强调,“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4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③。党中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思想来源,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念。

三、百年文化制度建构的启示

百年文化制度建构启示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应该把握文化制度建设相关要素的均衡性,保持文化制度的包容性和张力,遵循文艺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辩证看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正确认识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的关系。

(一)把握文化制度建设相关要素的均衡性

把握文化制度建设相关要素的均衡性至关重要。文化制度建构需要正确处理文化与政治、市场、社会之间关系。处理不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文化制度建设就容易失衡。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过于强调文艺的意识形态功能,把文艺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同时,过于强调文化生产的计划性,单纯依靠行政力量配置资源,不利于调动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影响了文艺价值和功能的全面发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生产力极大释放,文化市场空前繁荣。但也出现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和娱乐功能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功能的全面发挥。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有效纠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考三。

② 如早期党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刊登了瞿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该文继承“五四”反传统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文章指出:“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礼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载《新青年》(季刊)1923年第1期。

③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年,第313页。

正了过度市场化倾向,保证了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但也要注意防止行政干预过多而导致市场主体活力不足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把握文化制度建设相关要素的均衡性,深刻认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市场、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以文化与市场的关系为例。如何认识文化市场的功能和作用是文化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对文化市场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误区:一种是否定文化市场的价值和积极意义,一种是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市场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特点:

1.文化市场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载体。第一,市场机制能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文化生产领域经历了由计划主导到市场主导的转变。改革开放以前,文化生产领域是计划配置资源。文化产品提供方只能是国有文化单位,生产什么样的产品、产品销售以后的收益与生产者没有多大关系。这使得计划体制难以调动文化生产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者的创造力。文化市场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市场机制调动各类社会力量参与文化产品生产,同时将文化产品的市场收益与经营者的收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无疑,这极大地激发了文化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第二,市场机制有利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马克思就曾称赞市场具有自我平衡的机制。他认为,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自我平衡调节机制乃是“美好和伟大之处”。文化市场能够通过优胜劣汰机制,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以价格为基础的,而价格又是由价值决定的。价值规律通过市场交换形成分工和协作的社会生产机制,以市场价格自动调节生产和需求,以利益导向支配人们的文化消费行为,引导文化要素的流动和重组,使之在各生产部门之间实现合理配置。第三,市场机制促进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消费主体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要求文化产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想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就必须不断推出新的文化产品。同时,不同文化消费需求也使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在市场都有其生存空间。

2.市场配置文化资源存在失灵问题。在现代社会,影响文化市场的因素越来越多,市场失灵的问题日益凸显。第一,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发地产生优秀作品。市场的逐利本能,导致投资方关注流量、消费者喜好、产品销售更甚于产品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影视市场为例,受投资方、消费时尚、流量等因素影响,宫斗剧、玄幻剧、搞笑剧等大行其道,反映民生问题的现实题材、艺术电影往往得不到市场的青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屡见不鲜。第二,市场机制有可能形成寡头垄断。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平台对文化生产和消费行为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受利益驱动,一些产品发布平台凭借对市场价格的控制权,长期维持着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比例,压缩了中小文化企业的生存空间。一些产品评价平台受资本诱惑,出现人为操纵市场的行为,粉丝灌水、恶意差评等现象时有发生。第三,市场机制不能自发地维护社会公德。一段时间里,文化市场出现的低俗、庸俗、恶俗现象就说明这一点。如一些媒体为提高收视率、发行量,不惜弄虚作假;一些演职人员为吸引眼球不择手段,有意挑战社会公德;文化产品为吸引观众,随意戏说历史、恶搞现实等。

上述特点说明,要保持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就要把握文化与市场的均衡性。既要发挥市场配置文化资源的积极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缺一不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需要综合治理。一是加强监管,规范各类市场行为;二是加强文化消费引导,提高消费者素质,倡导健康的消费风尚;三是建立信用体系,强化市场主体自律;四是重视系统治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二)保持文化制度的包容性和张力

历史制度主义学派认为,一种制度稳定以后,由于思维惯性会形成内在的自我强化机制,形成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有助于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但往往导致体制机制僵化,形成制度僵滞。

新中国成立前夕,欧阳予倩、蔡楚生、史东山、夏衍等16位著名电影工作者向中共中央提交了《电影政策献议》,对电影业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建议积极扶持民营股份制电影公

司发展^①。这个建议今天看来堪称真知灼见。但在当时“一切向苏联老大哥看齐”的时代背景下,这一宝贵建议很难被采纳。

防止路径依赖引发的不良影响,就要尽可能使文化制度具有包容性和张力。习近平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②应鼓励各种学术思想、见解自由的争论和碰撞,为新理论、新观念、新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提供生长空间。改革开放初期,诗歌界围绕朦胧诗进行的争论就是一例,围绕朦胧诗孰优孰劣,诗歌界畅所欲言,最后形成共识,促进了诗歌的创新和发展。

(三)遵循文艺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1.遵循文艺产品价值规律。文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功能,如激励功能、认识功能、愉悦功能等,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就是对文艺功能的精辟概括。马克思、恩格斯都非常重视文艺作品认识社会的功能。恩格斯说,巴尔扎克伟大之处在于,他的作品“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③。

2.遵循艺术接受规律。一是寓教于乐。文艺的基本特点是让人愉悦。英国著名文化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认为,在现代社会,追求轻松和娱乐是人们欣赏艺术的主要动机。因此,具有吸引力是文艺作品发挥功能的关键。二是善于讲故事。叙事性文艺作品要有吸引力,很重要的是要善于讲故事。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文艺作品要讲好故事。故事本来都是很好的,有的变成了文化作品以后,却失去了生命力。讲故事有很多种方式,要善于选择叙事角度。习近平同志举例说,电影《智取威虎山》就拍得有点意思,手法变换了,年轻人爱看,把现实的年青人和当时的年青人对比,讲“我奶奶的故事”,就很有新意^④。

3.遵循文艺创作生产规律。一是重视文化创新,也要重视文化传承。文艺需要创新,一部文艺发展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文艺也需要传承,因为文艺创作具有一些普遍遵循的内在规律,比如内容为王、典型塑造等。二是完善文化内容管理机制。以影视业为例,要进一步细化审查标准,增强对影视产品尺度把握的准确性。同时也要适应市场要求,缩短电视剧审查周期。还要保持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减少影视企业政策风险和其他风险。

4.深入研究文化传播规律。重视研究文化国际传播规律,深入探索中国故事的国际化表达方式,扩大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善于从中国故事中提炼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和表达方式,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四)辩证看待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具有两种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具有两个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指文化生产应提供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健康向上、具有审美意义的文化产品;经济效益是指文化产品的市场收益。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原则。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

① 《电影政策献议》提出:“一切私营制片公司,凡致力于进步影片具有成绩之摄制者,应予以积极之扶持。”(第七条)“鼓励并扶助优良之电影工作者,组织合作社性质之制片机构,政府对之应酌予放贷资本,或配给器材。”(第8条)这里所说的“合作性质的制片机构”,实际上就是电影人自办的股份公司。参见蒯大申、饶春来:《新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第138页。

②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③ 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

④ 陈新华等:《文艺中国新开局》,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9年,第125页。

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①。习近平同志强调:“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②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文化建设的目标决定的。文化建设的核心目标和根本功能是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丰富人的精神生活、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社会生活建立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而且在知识、道德、审美等方面全面发展。因此,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文化产品价值实现的最佳状况。社会效益是文化机构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经济效益是文化机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两者缺一不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文化市场环境的影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往往存在背离的现象,有些艺术品质较高的文化产品经济效益不佳;相反,有些有较高票房收入或收视率高的文艺作品却充斥着低俗、庸俗的内容和观念。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必须纠正。也应防止两种倾向:一是空谈作品的社会效益,忽视传播效果;二是把社会效益与政治效益混为一谈。这两种倾向都偏离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要求。

(五)正确认识文化安全和文化发展的关系

要高度重视文化安全。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要“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当今世界各国间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益频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更加紧迫。

1.正确认识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异同。从内涵上看,文化安全是比意识形态安全更大的概念。文化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但并不等同于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法》要求“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加强文化安全建设就是要增强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能力。从我国文化发展现状看,“不良文化”主要包括危害政治安全的文化、激化民族矛盾和宗教冲突的文化、违背社会公德的文化、侵犯个人权利的文化。要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上述四类不良文化。同时,要善于区别不同性质的文化,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文化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2.文化安全是一个动态概念。文化安全是动态概念,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文化安全状况随着文化内容和接受者的改变而改变。一般来说,文化安全状况与文化产品接受者的素质成正比。同样的文化产品,接受者的素质越高,其文化安全系数就越高、所受到的威胁就越小。同样的文化内容,适合成年人,不一定适合儿童;适合高素质人群,不一定适合低素质人群。第二,文化安全状况与一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一般来说,文化安全状况与国家总体状况成正比。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越好,文化安全状况就越好;反之则较差。第三,文化安全状况与文化背景、身份等直接相关。一般来说,不同民族之间文化接受度与文化差异成反比。文化贸易中有一个叫“文化折扣”的概念,指国际市场中的文化产品会因文化背景差异不被其他地区受众认同或理解而导致其价值的递减。比如中国文化和东南亚国家文化相近,与欧美国家文化则差异较大。因此,中国文化产品进入东南亚市场较为容易,进入欧美市场难度就大得多。文化背景差异越大,被不同国家或地区受众接受的程度就越低,对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威胁就越小;相反,文化安全系数也就越高。

3.协调好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文化安全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十分重要。文化要讲安全,安全是发展的条件;文化更要讲发展,发展是安全的基础。维护文化安全应以

^①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9月23日,第1版。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5页。

发展为前提。只有发展和安全并重才能增强文化竞争力,防范和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和影响,实现持久的文化安全。在国际文化交往和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时,要坚持文化自信,以开放为原则、安全为底线。诚然,在文化开放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文化安全问题,但只要实事求是、理性辨别、科学应对,便都能有效化解。

The “Change” and “Unchanged”: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Qi Shuyu

(Chinese Academy of Governance, Beijing 100089, P.R.China)

Abstract: Regulating human behavior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institution. Human activities include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spiritu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ion also includes two major parts that regulate human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spiritu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 func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 is to standardize people's spiritu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Cultural institution is rich in connotation, focusing on 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cultur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etc. Cultural institution is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affect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A good cultural institution can stimulate cultural vitality and promote cultural prosperity, while a bad cultural institution will stifle cultural vitality and hinder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ulture,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cultur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The centennial cultural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proces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historical stages: the new democracy perio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the reform-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eriod, and the period from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presen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include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al work, the unity of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the continuous absorption of foreign beneficial culture, and the strong self-adjustment and improvement capabilities.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are as follows: we should grasp the balance of the relevant elements of cultural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maintain the inclusiveness and tension of cultural institution, deeply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literature and art development, dialectically treat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ecurity and its development.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ocialism; Cultural institution

[责任编辑:郝云飞]